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本節爰就涉及登陸移民群際接觸與當地化議題的相關文獻，進行鳥瞰，並藉此發展出本研究的相關假說。

一、移民與身份認同

「遷移」(migration)是個普遍而複雜的現象。遷移是人群在地域和居所上的永久、長期或週期性移動轉換，經常涉及了城鄉、國家、社會和文化等邊界的來回跨越，以及生活局部或全面的改變，從工作、就學、居住環境的更替，到習俗、語言、心態和身分認同的轉化。同時，遷移現象對於出發點和目的地的社會，都有顯著的衝擊影響，展現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時代的降臨，部分展現為各種不同原因而遷移的人群大幅增加，形成理解當前人類社會結構動態、社會關係與過程的關鍵層面。隨之而來的關注焦點則是身份認同的流動，當個體初次體驗遷移之時，剎那間文化的失落感像浪潮般莫名衝擊而來，可能使人不自覺地陷入身份認同的十字路口。

所謂身份認同，是指個人對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與「身份認同」這一概念有三個相關問題：「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到何處去？」。認同標示出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分野(division)與從屬類別，並有助於我們去界定周遭一切不穩定的、各種因地制宜的界線，以使置身於其中的人可以理解這世界，並察覺世界與自我的關係。對此，吳乃德曾提出：「在歐美社會科學的傳統中，『認同』指的是將自己視為某一『群體』(group)的一份子……以某一具有某類特性的群體...為對象，將自己視為該群體的一份子，並且認為自己和所屬群體有共同的特性和利益，甚至共同的『命運』」。……也就是說，認同的對象是『群體』，是人所構成的群體。可是『國家』卻是一個統治『權威』、政治權力『體制』。它不是一個我們可以歸屬，可以和它分享光榮和恥辱的『群體』。」¹

1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第一期（1996年7月），頁5~39。

Stuart Hall對於可以將認同視為起源於「親屬血緣關係」(kinship)，以及社群成員所共享的歷史真實之觀點，提出了質疑，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和族群散居」中曾申明「身分有其歷史性和發展性，文化身份同屬於過去及未來，不只是什麼，還有變成什麼的可能。」² 略有不同的，Paul Gilroy則使用「離散」(diaspora)這個概念來挑戰「本質主義」。「離散經驗」使人們理解到認同包括了「流動性」(fluidity)與「偶然性」(contingency)這兩個觀念，換言之，認同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形成的，這也使本質主義及其政治主張受到質疑。³ Paul Gilroy如是解釋：「離散是各民族散居各地的結果，無論是由於戰爭、壓迫、貧窮、被奴役，或者為了尋求比較好的經濟與社會機會所造成的族裔散居，都不可避免使自己的文化，容易被新的影響力以及壓力所影響。因此，作為一個概念，離散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它讓人們瞭解認同並不是一種被地域或者國籍因素，以不證自明的方式所決定的若干事物。」換言之，對移民社群而言，「離散」的經驗更為凸出，例如王明珂便認為：「移民的社群本身雖然是一個結構性失憶的溫床，讓移民者在短短的數代中，對故鄉失去記憶，但是也往往使得原來並不一定分享共同歷史的人群，在這個社群中透過尋根活動，來創造新的集體記憶與認同。」⁴ 由此觀之，移民至大陸的台灣人社群極可能通過記憶的重新建構，創造出新的身份認同。

二、民族 / 國族認同之爭論：「原生論」與「建構論」

目前有關民族 / 國族認同的領域，向來存有「原生論」(primordialism 或稱「本質論」essenti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ivism 或稱「工具論 instrumentalism」)之爭辯。⁵ 「原生論」主張族群認同建立在先天的血緣文化特徵，個人身份認同

2 Kathryn Woodward 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1~11。

3 Kathryn Woodward 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頁 1~11。

4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1997），頁 58~59。

5 石之瑜、姚源明，「社會科學認同的幾個途徑」，**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1~36。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原生論」應該屬於「本質論」的一支，而「工具論」則為「建構論」的觀點之一。

是固定的(fixed)，缺乏變遷的能動性。⁶「建構論」側重族群認同乃基於社會結構的建構與制約，惟有社會結構變化方能影響身份認同變遷；⁷換言之，不論是「原生論」或「建構論」，雖然位於辯論軸線的兩端，但皆從根本主義立論，試圖找出身份認同形成的第一因，忽略了其他面向的重要性。⁸

然而，由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造成「國家疆界」不再像以往那般牢固，資本、貨物、人才與資訊較之過去更能跨界流動，這意味著個人生活空間日漸超越民族國家所制約的疆界，個人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產生變化。換言之，全球化挑戰了民族國家之於公民的單一權威與疆界控制所形成的空間設定，而對公民身份與認同產生巨大影響。日漸增加的跨國界流動人口，也就是在全球範圍流動的族群，對各國內政與外交的影響愈來愈大。⁹

社會學家經常提出理論模型來描述多族群社會的族群關係模式，這些理論通常認為族群服從以下兩條路徑之一：日漸融合或維持分離。簡而言之，這些群體可能在文化上變得更相似，相互交往變得更自由，產生同化(assimilation)；或者在文化上相區別，在社會上相隔離，形成多元化(pluralism)。一般來說，強調逐漸融合的同化模型適用於多族群社會中那些自願進入的群體，而多元化模型的某種形式則適用於那些通過非自願遷移、征服、擴張而進入的群體。¹⁰

綜合各家學說，令筆者感興趣的議題是，究竟族群關係在何種條件下才會產生「同化」現象，此乃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課題，因此，筆者嘗試揉合「原生論」

6 「原生論」之相關研究請參見 Clifford Geertz,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255~311;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Cambridge, U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6); 另外請參見 Anthony D. Smith 著，龔維斌、良警宇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7 「建構論」之相關研究請參見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1969), pp. 9~38; 根據 Gellner 的看法，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實皆為現代化過程的產物，請參見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 (台北：聯經，2000)。另外，Benedict Anderson 提到：「一個疆域和行政範疇相關的象徵和儀式共同建構的民族身分或民族意識。」請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布* (台北：時報，1999)。

8 汪宏倫，「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第一期 (2001年6月)，頁 203~208。

9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ike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p. 297.

10 Martin N. Marger 著，祖力亞提·司馬義譯，*族群社會學*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頁 93~94。

與「建構論」之視角，歸納出三種影響族群同化的因素。

(一)原生論

◆族群身份

Clifford Geertz 是「原生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強調在民族(nation)形成的過程中，源於族群的原生紐帶(primordial ties)不可或缺，族群與民族主義的形成主要確認在族群性的存在基礎上，主張這些先於個人而存在的文化特質重要性，例如語言、血緣、種族、宗教、共同的歷史起源等。¹¹ 不管群體以何種方式、何時進入「東道國」，也無論其人口結構如何，只要它與支配群體在文化上較為相似，同化就更容易實現。¹² 換言之，原生的情感連繫構成了身份認同的基礎。Anthony D. Smith 則駁斥了建構論所宣稱的現代性與民族主義的相關性，指出「族群」(ethnic community)是一群意識到自己擁有與其他群體不同的歷史記憶、起源神話、符號象徵及傳統儀式的群體，因此，民族國家的社會關係和文化實踐根植於代代相傳的傳統、神話、記憶、象徵和價值觀。¹³

由於族群身份的文化親似性，在登陸工作的台灣人之中，外省人比本省人更能勾起記憶深處的「中國認同」，使得外省人較易增強其原有的「中國認同」；相反的，本省人原始的「台灣認同」深植心中，難以轉為傾向「中國認同」。

(二)建構論

◆社會認同

「工具論」可以 Ernest Gellner 為代表，作為一個現代主義者，Gellner 認為國族乃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主權國家因應工業化社會的同質性與可規格化之文

11 請參見 Clifford Geertz,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255~311; 汪宏倫, 「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 頁 203~208。

12 Martin N. Marger 著, 祖力亞提·司馬義譯, *族群社會學*, 頁 102。

13 Anthony D. Smith 著, 龔維斌、良警宇譯, *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 頁 33~52。

化需求而建構了國族，因此是國族主義創造了國族神話，反駁了「原生論」的主張：種族性及文化性(ethnicity)是國族建立之根基。¹⁴ Benedict Anderson 的看法與 Gellner 可以相互呼應。Anderson 認為，資本主義、印刷技術以及方言的交互作用，賦與了民族主義的基礎，試著將民族界定成「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民族主義可以使個體與那些從未相遇、而且也永遠不會相遇的他人聯繫起來。¹⁵ 與他們略有不同，但仍可附屬於「工具論」之下的是 Fredrik Barth。他認為族群身份並非客觀的文化要素總合，他將族群定義為「行動者本身自我歸因與識別的類屬」，認同是族群界線的建構因子，行動者把自己歸屬到特定的族群，不僅意味著他持有該族群的基本認同，同時也指出根據那些重要的身份判準，他們對自己及被他人評價。¹⁶

但另一方面，上述學說對認同變化的過程卻著墨不多。「認同」是個人選擇情感依附對象的過程，「社會認同」意指一種含有他人之社會類別定位自己的心理歷程。社會學家採取主觀建構論之觀點，強調族群認同的主觀性與情感性，族群成員會透過建構記憶與結構失憶的歷程，自由心證評斷己族群與他族群的相似或相異程度。¹⁷ 由此可見，社會認同理論與建構論之觀點不謀而合。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最早由 Tajfel 和 Turner 提出，對群體行為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做出了新的解釋，成為群體關係研究中影響深遠的理論。Tajfel 將社會認同定義為：「個體認識到他/她屬於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她的情感和價值意義」。¹⁸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通過社會分類，對自己的群體產生認同，並產生內群體偏好和外群

14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頁 5~13。

15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布**。

16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1969), pp. 9~38.

17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20 期（2003 年 12 月），頁 39~71。

18 「社會認同理論」之相關研究請參見 Henri Tajfel and John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tephen Worchel and William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 Hall, 1986), pp. 7~24. 以及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心理科學進展**（北京），第 14 期第 3 卷（2006 年），頁 475~480。

體偏見。個體通過實現或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來提高自尊，積極的自尊來源在於內群體與相關的外群體的有利比較，當社會認同受到威脅時，個體會採用各種策略來提高自尊。個體過分熱衷於自己的群體，認為自己的群體比其他的群體好，並在尋求積極的社會認同和自尊中體會團體間差異，就容易引起群體間偏見和群體間衝突。「社會認同理論」強調，認同在群體關係中產生，把個體對群體的認同放在核心的位置，群體成員的集體剝奪感在他們對群體表現明顯的認同時更為敏銳。據此，莊耀嘉指出，台灣民眾的集體社會認同(collective social identity)長期受到中共打壓，應會藉由對大陸人抱持更負面的認知，抑或更珍視台灣人的正面特性，來提升自身所屬群體的相對地位。¹⁹

正當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興起，對台灣認同的建構具有推波助瀾之力同時，亦面臨中國大陸軍事威脅和經濟市場的拉力，「麵包」或「愛情」對台灣民眾認同變動之影響，一直是國內學界關注的焦點。吳乃德之實證研究指出，「感性」認同吸力似乎大於「理性」利益的拉力。耿曙、陳陸輝、黃冠博等人之實證研究亦指出，對於兩岸經貿議題的態度，台灣民意較多受到「感性」層面的個人認同所影響。²⁰ 由於台灣人普遍對大陸人存有偏見，當台灣人登陸工作或定居後，將在尋求積極的社會認同和自尊中體會台灣人和大陸人的差異，造成偏見愈來愈深。惟族群認同會調節對大陸人的相對偏見程度，台灣認同者的相對偏見最強，次為雙重認同者，中國認同者的相對偏見最弱。

◆接觸機會

人際接觸被社會學家視為降低偏見、歧視的重要因素，Emory S. Bogardus 在1925年即提出，親身經驗可以使個體獲得新的發現，往往造成態度的轉變，例

19 莊耀嘉，「族群與偏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社會認同理論的檢驗」，*本土心理學研究*，第20期（2003年12月），頁73~104。

20 請參見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第9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5~39；Shu Keng, Lu-huei Chen & Kuan-bo Huang, "Sense, Sensitivity, and Sophistication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4 (Dec. 2006), pp. 23~66.

如透過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提升彼此的信任程度，導致原先對「異族」的反感，可能轉變為「同族」的好感。²¹ Gordon W. Allport 接續提出「接觸假設」(contact hypothesis)，意指不同族群的緊密接觸，會助長彼此的正面態度。刻板印象會導致族群之間的偏見或衝突，如果偏見是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頻繁接觸可以提供彼此資訊及知識，以減少偏見。延續Allport之接觸假設論點，Rupert Brown亦主張，降低族群之間張力與敵意的最好途徑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讓他們彼此發生系統性接觸。²²

談到接觸如何在不同族群間製造有利的影響，Allport進一步指出，在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接觸情境中，減少偏見的四個要素包括：(1) equal status；(2) common goals；(3) institutional supports；(4) the perception of common interests and common humanity between members of the two groups。當互動雙方地位相同、追求共同目標、背後具備制度的支持(例如法律、習俗、當地氛圍)，並且認知到雙方具有共同利益和人性時，族群接觸將帶來良性關係的發展。²³ 然而Allport也提醒，表面膚淺的接觸無法帶來新的資訊，只會增強刻板印象，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謹慎地逃避親密關係自然被理解成「不信任」或「不喜歡」，進一步確認了最初存於心中的疑慮，所以，表面膚淺的接觸只會惡化原本敵對的族群關係。²⁴

Thomas F. Pettigrew建議以三層次模型來解釋接觸經驗如何漸入佳境：(一)「除類化」(deategorization)和「個人化」(individuation)首先發生，雖然一開始的互動存有張力，但是去分類化有助於減少負面情感；(二)一旦第一階段成功，接觸進入第二階段，群體的特點會導致對外群體的正面情感；(三)最後，第三階段「再類化」(recategorization)，有助於達到共同的內群體。²⁵ 伊慶春及章英華

21 Emory S. 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and Its Origi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Vol. 9 (1925), pp.216~226.

22 「接觸假設」之相關研究請參見 Gordon 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1954); Rupert Brown, *Prejudice: Its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5), p. 236.

23 Gordon 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p. 281.

24 Gordon 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p. 264.

25 Thomas F. Pettigrew,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Research and New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9 (1998), pp. 65~85.

亦指出，社會接觸乃根本的社會結構元素，政治態度固然能敏銳反應當下的社會情勢、進而可能影響個人的族群態度，但接觸假設所揭櫫的異族接觸之正面效應，應仍有其長久持續性的影響，會因為接觸內容之差異而導致不同的後果。²⁶

「接觸假設」預期，如果族群成員之間有個人層次的跨族群社會互動，族群意識將不容易發展；反之，族群區隔是族群偏見(或意識)滋長的溫床。這是它和區隔論相似之處。「區隔論」認為族群接觸可以降低族群意識；「競爭論」卻指出必須視接觸狀況而定，如果是競爭性的接觸，反而將增加族群意識。²⁷ 接續的研究者也進一步闡述族群接觸過程所涉及的社會心理機制如何減少偏見。他們指出，由於族群偏見涉及對外族群「類屬性」的刻板印象，個人層次的接觸、互動、與熟識，有助於人們在社會互動情境中親身地認識及了解他人，減少以類屬性的刻板印象去看待外團體成員，因此可以降低族群偏見。若如上述，如果台灣人登陸後，與大陸人接觸交往的頻率、深度增加，發現大陸人特質不符合先前的刻板印象或偏見時，可能推翻原先對大陸人持有的反感，轉而漸增好感。

三、連綴社群與多元認同

首先，如前所述，本研究之基礎或描述部分，在於確實掌握長居大陸地區「台灣人」的認同變化，而其核心問題則環繞「雙重認同」的動態。所謂「雙重認同」，乃源自於國內石之瑜、李英明、張亞中三位學者，有關「多元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極富啟發之論述。其中，石之瑜首開先河，取法「後現代主義理論」，對認同之「二分法」，大力批判，並預見兩岸間「集體認同的游移」。²⁸ 張亞中則藉「歐盟經驗」，證明「重疊認同」的可能，並以此為本，為其規模宏遠的「統合論」奠定微觀基礎。²⁹ 李英明踵其後，指出兩岸長期以來皆從國家民族議題

26 伊慶春、章英華，「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學*，第十二期（2006年12月），頁191~232。

27 王甫昌，「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第四期（2002年12月），頁27~32。

28 石之瑜，*兩岸關係概論*（台北：揚智，1998），頁84~96。

29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台北：生智，2000），頁84~96。

操作的途徑，通過凸顯和堅持國家主權來解決各自的問題」，然而在全球治理的格局下，國家不再是操作認同的唯一主導者，在不斷發展的多元主體的交叉互動過程中，多元認同的操作已不可免。³⁰

接著，耿曙接續與上述三人對話，並進一步完善魏鏞所提出的「linkage community」概念。³¹ 據其所見，若就兩岸「連綴社群」而言，若按前述「原生論」理解，則兩岸既屬同文同種，台灣人一旦面對大陸人，將自然水乳交融，台灣認同必將招架乏力，終爾灰飛煙滅。³² 因此，若稍假時日，「連綴社群」的成員，或將融入對岸社會，或將扮演兩岸橋樑，將雙方綴為一體。但若從「工具論」角度觀察「連綴社群」，則其多數的成員，均曾歷經解嚴以來到「新國族意識」建構，已形成與對岸明顯有別之國族意識，一旦親身接觸異類，「差異意識」必將油然而生，反將更將篤定其台灣認同。因此，若將「連綴社群」作為研究標的，有助於釐清「原生論」與「建構論」的解釋力。³³

在台商認同之相關學術研究中，學者發現，近年登陸就業人士教育程度愈益增加，較多大專以上學歷的專業人員，西進產業以高科技業和服務業為主流，也因此他們的生涯規劃，遠不同於早他們數年西進的傳統產業「頭家」。方孝謙曾根據訪談研究，預測四十五歲以下，攜家帶眷到大陸的台資或外資公司上班的「台幹」，不論省籍為何，會在三至五年內「在地化」，繼而認同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³⁴

此外，耿曙亦從田野調查中發現，近年湧入大陸的一批台灣人，往往表現出「國家認同淡薄」及「彼此界限泯沒」，此特徵同時表現為與當地人的相處模式：他們之中，已經少見「過客」與「自我封閉」的心態，取而代之的做法是積極拓展當地的社會關係，努力將自身融入大陸的社會中。同時，早期台商對當地人的

30 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生智，2002），頁 184。

31 「linkage community」之原始概念請參見魏鏞，「邁向民族內共同體：台海兩岸互動模式之建構、發展與檢驗」，**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10 月），頁 1~55。

32 耿曙著，「連綴社群：WTO 背景下兩岸民間互動的分析概念」，頁 57~87。

33 耿曙著，「連綴社群：WTO 背景下兩岸民間互動的分析概念」，頁 57~87。

34 方孝謙，「全球化衝擊下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許光泰、方孝謙、陳永生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政大國關中心，2003），頁 489~504。

種種歧視心理，也逐漸消弭於無形。³⁵ 鄧建邦則試圖跳脫民族主義的敘事框架限制，以跨國主義觀點理解台商的跨國移民現象，他根據田野調查結果指出，台商的跨界流動處於「暫時性的移居」與「長期性的移民」兩個概念的中點，不斷往返於兩岸之間時，形塑了一種跨社會的生活形式與認同型態。³⁶ 李志勇調研上海台商為何融入當地社會又游離於當地社會後，提出台商的中國人、台灣人雙重身份處於混淆、不穩定中，一方面他們渴望身份認同可以得到歸宿，另一方面，此身份標籤的游移與不確定，卻又成為有利生存的手段。³⁷ 換言之，台商可能出現雙重認同，認為其同時擁有兩個家鄉，同時也引發了何種因素較能解釋或預測移民當地化的辯論。

此外，「社會認同理論」以及「接觸假設」兩者立場看似相左，但皆不脫「建構論」之範疇，可視為同一論述軸線之兩端，其中蘊含意義在於個體透過群際接觸可以解構其原生的社會認同，再重新建構新的社會認同：前者主張個體通過社會分類，對自己的群體產生身份認同；後者則強調深刻的群際接觸可以提升彼此的信任程度，導致原先對「異族」的反感，可能轉變為「同族」的好感。換言之，群際接觸程度之深淺將大大影響個體是否能夠打破原有對外群體的偏見及刻板印象，不再將外群體視為異族，甚而進一步將異族視為同族。同時，「接觸假設」較能說明促使移民當地化的「過程」(processes)與「機制」(mechanisms)，反映全球化所賦予移民當地化的能動性，以及透過親身接觸而降低族群之間偏見和歧視的可能性，因此，筆者以「群際接觸」作為研究「登陸」台灣人當地化的途徑。

由於近年來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吸引，愈來愈多的台灣年輕人選擇至中國大陸工作、進修或定居，這些年輕人多半成長於解嚴的年代，接受的教育也強調台灣意識，如果登陸的年輕台灣人當地化程度逐漸深化，更能突顯全球化浪潮席捲的威力，驗證個人層次的接觸、互動與熟識，有助於個人在社會互動情境中親身認

35 耿曙，「『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頁 12~13。

36 鄧建邦，「我們是誰？跨社會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頁 10~11。

37 李志勇，台商「異/己」：「異域/故鄉」之認同區辨（以上海從事文化產業的台商為例），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2008)。

識及了解他人，減少以類屬性的刻板印象去看待外團體成員，因此可以降低族群偏見、增進雙方共識。

四、研究架構與假說

本研究為經驗研究性質，所涉假說的描述、概念的界定、變項的測度、以及執行的過程等，簡要報告如下。

(一)研究架構

筆者認為，在真實世界裡，無論個人「原有省籍」之身份背景為何，其所處客觀環境之群際接觸機會，將會形塑其生活空間及社會網絡，影響其對大陸人的態度以及當地化的意願與程度。因此，台灣人接觸大陸人的管道愈廣、程度愈深，可以增加新的資訊，減少對大陸人之偏見與刻板印象，亦降低自身之相對優越感，對大陸人之觀感從「異族」變成「同族」，「反感」漸少，「好感」日增，可能愈益傾向當地化。換言之，本研究之架構如圖一所示，其進一步解釋則在下小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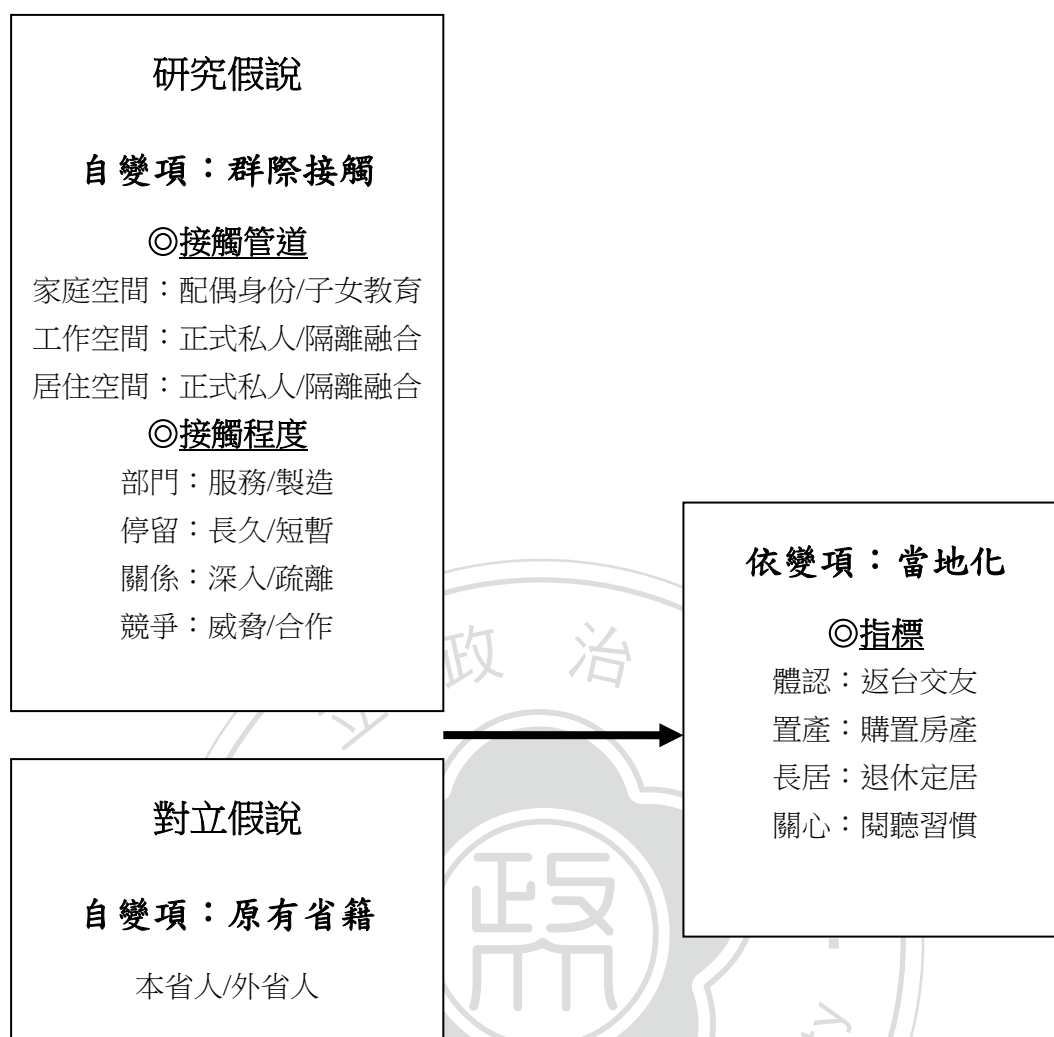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二)研究假說

根據上述架構，筆者的研究假說設定如下：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台灣人，其所處環境之群際接觸管道，將會影響其當地化的程度。因此，在自變項方面，「接觸管道」包括三個評估指標：家庭空間(配偶身份、子女就讀學校)、工作空間(正式與私人；隔離或融合)與居住空間(正式與私人；隔離或融合)。

◎**家庭空間**：如果台灣人樂意與大陸人交往、結婚，與大陸籍配偶頻繁接觸下，其當地化程度應會增加。子女教育是台灣人的大事，如果願意讓子女就讀當

地學校，與大陸人的接觸機會也將大幅增加，其當地化程度應會增加。

◎**居住空間**：如果台灣人與當地社區混居，平時來往的鄰居多為大陸人，其當地化程度愈可能增強。

◎**工作空間**：如果台灣人工作上交際應酬的對象多半為大陸人，私人宴飲的對象多為大陸人，其當地化程度愈可能增強。

其次，「接觸程度」包括四個評估指標：部門(服務或製造)、停留(長久或短暫)、關係(深入或疏離)、競爭(威脅或合作)。

◎**部門**：由於部門性質的差異，在台資企業中，服務業的大陸幹部、員工比例較製造業來得高，使得台灣人在服務部門接觸大陸幹部、員工的程度比製造部門來得深，因此，服務部門之台灣人較製造部門之台灣人，其當地化程度愈可能增強。

◎**停留**：停留當地時間的長短，亦可能影響接觸程度的深淺，因此，台灣人停留在大陸時間愈久，其當地化程度愈可能增強。

◎**關係**：如果登陸台灣人與當地人的社會關係網絡愈緊密，談笑往來密切的大陸親友愈多，接觸程度愈深，其當地化程度愈可能增強。

◎**競爭**：如果台灣人與當地人之互動地位處於平等，不帶威脅的競爭關係，且認知到雙方具有共同利益和人性時，接觸將帶來良性關係的發展，其當地化程度愈可能增強。

在依變項方面，「當地化程度」包括四個評估指標：體認(返台頻率、是否定期返台投票、是否與大陸人交心)、置產(是否在大陸購置房地產)、長居(是否規劃在大陸長期定居)與關心(是否經常閱聽台灣媒體)。

◎**體認**：流動者對移出地 / 移入地的聯繫關切的程度，想必會影響其當地化程

度。如果返台頻率高、定期返台投票或者無法與大陸人交心，應可推斷其當地化程度較低。

◎**置產**：在當地購置房地產與否，可以觀察台灣人對當地的認同程度，如果已在當地置產，表示其當地化程度增強。

◎**長居**：「安居樂業」是每個人的願望，可以作為觀察台灣人的當地化，如果個人規劃在大陸長期居住，攜家帶眷至大陸生活，甚至退休後留在大陸養老，或者已有在當地長期發展或生活的準備，表示其當地化程度增強。

◎**關心**：關心台灣的頻率愈高，應可推斷其對台灣仍有相當的關切，因此可以觀察台灣人是否已漸漸將大陸當作「家」，如果經常閱聽台灣媒體，表示當地化程度尚淺，偶爾表示程度普通，而不再閱聽台灣媒體，則顯示其當地化程度較深。

五、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式，試圖藉由個案深度訪談、赴中國大陸實地田野調查，以蒐集質性資料，細節如下所述：

(一)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族群偏見」與「群際接觸」是一種個人特殊的、主觀的心理狀態，不但具有隱蔽性和敏感性的特質，也受到社會脈絡的影響，因此有可能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呈現其複雜性，加上對台商／台幹進行關於認同的量化研究具有高難度，因此，本研究以「質化方法」為主，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研究法，主要在蒐集、分析質化資料，相信對研究台商／台幹的主觀意向及其所處的社會脈絡，有相當助益。在質化方法中，本研究輔以「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瞭解台商／台幹群際接觸與當地化的因果關係，亦即相關「心理性資料」，讓田野資料可以更加完善。

在田野工作階段，就實際訪談之程序而言，首要者為化解受訪個案可能存有的疑慮與防備，是使受訪個案了解筆者的研究內容及研究目的，解答受訪個案對研究本身的各項疑問，以使受訪個案終能暢所欲言，提供筆者需要的所有研究資料。接著，筆者請受訪者描述登陸工作的初衷及源由，在漫談時大致瞭解其背景，目的在於觀察受訪者在登陸前後群際接觸與當地化情形，藉以作為比較的觀察評估之一。

在訪談進行中，筆者鼓勵受訪個案抒發其感觸。在深度訪談結束後，隨即進行第二階段的半結構式問卷訪談，由筆者依照問卷預先擬定的題目逐項提請受訪個案回答，問卷訪談進行中，筆者時刻參照前一階段深度訪談所得的內容，如果發覺兩者之間有任何相關性，提請受訪個案一併說明解釋；若是在兩階段訪談中所獲得的答案之間，有任何出入之處，則筆者針對該議題深入詢問受訪者，以求徹底釐清受訪個案之確實意見。至於訪談過程中所獲之訪談錄音及「田野筆記」(field-notes)，則帶回台灣逐步釐清，以利資料分析。

(二)研究流程：田野調查時地

由於登陸的台灣人數量龐大，筆者無法訪談所有散居大陸的台灣人，遂將研究範圍先侷限於東莞及上海地區，且將研究對象聚焦於當地的台灣人。筆者實際操作之田野調查流程分為兩階段(請參見表一)，第一階段主要目的為前測工作，自 2007 年 07 月 25 日~2007 年 08 月 08 日迄，訪談地點限於製造業為主的珠三角工廠東莞，訪談個案數共 7 位；³⁸ 第二階段自 2008 年 07 月 23 日~2008 年 08 月 23 日迄，訪談地點除了以製造業見長的珠三角城市東莞及深圳以外，也擴及服務業發達的長三角城市上海及無錫，訪談個案數共 23 位。³⁹ 兩階段之田野調查前後總計 47 天，累積有效的深度訪談個案數達到 30 位(詳細的訪談對象清

38 2007 年田野調查訪談工作參與者包括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耿曙老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林瑞華學姊以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林芷榕同學。

39 2008 年田野調查訪談工作參與者包括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耿曙老師、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鄧建邦老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林瑞華學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林芷榕、梁廣榮、郭姿秀、呂政泰同學，感謝以上師長及同窗的大力協助。

單請參見附錄二)，在選取樣本時盡可能含括製造業／服務業或本省人／外省人等不同身份背景的受訪者。

表一 田野調查日程安排

日期	地點	時間 / 訪談個案數
2007.07.25~2007.08.08	東莞	15 天 / 7 個案
2008.07.23~2008.08.03	上海、無錫	12 天 / 11 個案
2008.08.04~2008.08.23	東莞、深圳	20 天 / 12 個案
總計		47 天 / 30 個案

